

· 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之七 ·

请勿翻印
请勿外传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五次入侵天津，终未能灭亡中国。

帝国主义五次入侵天津

始末简介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内部参考)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天津市政协秘书处编印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目 录

一、天津的战略地位.....	1
二、帝国主义五次入侵天津的经过.....	3
(1) 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第一次入侵天津.....	3
(2) 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第二次进攻大沽口.....	8
(3) 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第三次入侵天津.....	12
(4)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	16
(5)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	23
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29

一、天津的战略地位

天津是北京东大门，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天津从有史记载以来，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在天津筑城设防，也有五百七十年的历史。天津之聚为砦镇，即由金朝的戍兵直沽寨而形成。因为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都建都北京，天津就成为“京师门户”，明、清二个封建王朝在天津设卫，故有“天津卫”之称。

天津是战略要地，元朝初年即曾重兵驻守；明朝永乐二年（一四〇四年）开始筑城屯兵守御；明朝中叶日本侵略朝鲜，天津是支援朝鲜战争的后方。到清朝时，不但驻守重兵，并建立炮台，以做北京的屏障；清末训练新军，也开始于天津小站。民国以来的各系军阀，都把天津作为军事据点。由此可见天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帝国主义对天津早就垂涎三尺，把天津作为它们入侵中国的一个门户和据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百余年中，帝国主义为了把我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对我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其中先后五次侵犯天津：第一、二、三次是英法联军入侵，第四次是八国联军入侵，第五次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它们都把天津做为进攻北京的突破点，从大沽口、北

塘口登陆，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内地。我国广大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无能，五次交锋，四次失败。其中一九〇〇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天津，遭到了震动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沉重打击，打得帝国主义狼狈不堪，使帝国主义侵略军闻风丧胆。义和团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英雄气概。但这场斗争由于反动清王朝的出卖，并伙同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联合镇压，终于失败。帝国主义占领天津后进行了血腥屠杀和野蛮劫掠，对天津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九个帝国主义（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在天津强行霸占租界，把天津瓜分得七零八落。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天津又沦为日寇的殖民地。在日寇铁蹄下，天津人民惨遭蹂躏，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中国人民不愧是英雄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英勇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又重新把天津人民打入了地狱。为了求得真正的解放，人民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同美蒋作战。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美蒋反动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解放了天津。多灾多难的天津人民第一次见到了红太阳，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大地，也照亮了天津市，从此劳动人民才成了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二、帝国主义五次入侵天津的经过

帝国主义为了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中国，用暴力打开中国的北大门，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大量推销他们的商品，放肆地掠夺中国的工业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进而全面地奴役中国人民，从一八五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曾先后五次进犯天津。

(1) 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第一次入侵天津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侵略军为了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分别制造了所谓“亚罗”号事件（注一）和马神甫事件（注二）进犯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北大门，就沿海北上，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以夺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使普提雅廷为了趁火打劫，都表示在外交上和英法采取一致行动，并随同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一同北上。沙俄帝国主义者早在黑龙江一带扩展势力，野心勃勃地向远东扩张发展，一八五七年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先到大沽口向清政府索取利权，遭到拒绝后，转而南下与英、法、美合谋侵略我国。

四国公使北上前，曾给清政府照会，提出若干无理条款，强迫清政府接受，并威胁说，必须于一八五八年三月底前派钦差大臣赴上海会谈，否则即率兵北上。昏聩庸懦的清政府竟拖延不予明确答复。一八五八年四月，由四国公使率领的侵略军联合舰队二十余艘，分批自上海北上，至四月二十日，先后抵达大沽口外。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交涉，谈判一个月，毫无结果。五月十九日，遂由英使额尔金与法使葛罗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次日上午十点以前给以满意答复，否则将袭取炮台。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英法侵略军送招降书给谭廷襄，限两小时内撤退守军，交出大沽炮台。这时它们的六艘炮艇早已越过防波堤，停泊在炮台附近。在指定的时间没有得到答复，英法兵舰即开炮轰击大沽炮台，掩护步兵登陆。大沽有炮台四座，安设大炮三十尊，驻防军队有八、九千人。总督谭廷襄驻新城，提督张殿元驻西大沽，副都统富勒敦泰驻于家庄，总兵达年、副将德魁、游击沙春元、陈毅等分驻南北炮台。侵略军轰击炮台时，下层官兵奋起抵抗，他们顽强的抵抗精神与炮弹发射的准确，使敌人大为惊异。游击沙春元、陈毅均战死。守炮台的士兵英勇顽强，三次被英人炮弹击中，三次去而复返。又有一名守兵于英人逼近炮台时，单身从炮台上奋勇跳下，迎击敌人。可是负责指挥的文武大员，一闻炮声，心惊胆怯，谭廷襄首先乘轿而逃，张殿元、达年、富勒敦泰、德魁相率逃跑，士兵失去

指挥官，当然难以抗敌，大沽遂告失陷。

谭廷襄带着两千名残兵败将一路奔逃，侵略军跟踪西进，直达天津，占住望海楼等处。谭廷襄厚颜无耻地指派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专门供应侵略军队以牛、羊、鸡、鸭、乘马、肩舆等等。交战一方对另一方招待的这样殷勤周到，开战争史上的先例，也只有反动透顶的清朝官僚们才干得出来。

历史证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反侵略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当反动统治阶级一再退让，侵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天津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者。六月初，清政府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同侵略军谈判投降条件。桂良到津时，天津“军民遮谒道左，请率团练助官兵与夷人开仗”，（注三）却被桂良拒绝了。联军盘踞天津，日出掳掠抢劫，天津人民义忿填膺，“商议妥协，联为一气”，欲待其“入院搅扰”，“即行杀戮”。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牵着狮子狗在街上耀武扬威，天津市民怒气难遏，把他痛打一顿，打得他扔掉帽子和狗，抱头鼠窜而去。不久，翻译李泰国（英人）带一百名英兵，前来寻衅，这时城门已关闭，他们竟爬墙进城，城内的群众准备迎击，李泰国见众怒难犯，才被迫退去。又有一次，十几个侵略军在深夜抢劫永泰耀杂货局和庆馨德钱店，他们手持火枪短刀，撞开铺门。当时附近群众惊醒，随即登屋抛掷瓦砾，骤如雨雹，侵略者被打得头破血流，纷纷逃

窜。四国公使北上。胡夫曾黎益大庭赫武以数然普干雪科科

但是无耻的清朝统治者却畏敌如虎，他们事先在京津一带毫无防御，到敌军入境，他们又吓得失魂落魄。一部分主战派官僚虽然也在吵吵嚷嚷，但究竟怎样抵抗，依靠什么力量抵抗，心中完全无数，因此他们的主张只能是纸上空谈；另一部分大官僚主张赶快投降，如主持谈判的桂良、花沙纳说：“此后若再决裂，夷炮一开，不特津郡立时自乱，该夷带兵北窜，更觉可虞”。（注四）主持军事的谭廷襄说：“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注五）此外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说：“若用武则兵连祸结，断乎不可”。（注六）畏敌心理，溢于言表！

清帝咸丰在敌兵压境、门户洞开的情形下，惊惶失措，不得不授权桂良、花沙纳，在尽量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向英、法乞降。六月初，谈判在天津海光寺举行，英、法公使只和桂良会了一面，以后就把谈判交给李泰国和威妥玛去办理。李泰国等对桂良、花沙纳百般威吓侮辱，桂良、花沙纳说他们“往来公所，咆哮要挟”，“骄狠之情，有目共见”。（注七）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也不能掩饰李泰国的横暴态度，他写道：“李泰国是性情暴躁的；既然作为一个强加战败国以种种条件的战胜国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满口作威作福的腔调，打算就凭着这种凶狠的腔调，而不凭借论辩的力量来打倒中国方面的抗衡。他在整个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是使用这种腔

调”。（注八）

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对外使驻京、北方开埠和外人得入内地通商传教等条款最感头痛，力求讨价还价。可是侵略者咄咄逼人，好像已把绳索勒在清政府的脖子上，根本不容有丝毫动转。昏聩怯懦的清政府，根本没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因此也不敢与侵略军决裂。就像桂良、花沙纳所说：“该夷枪炮迅利，前见夷兵在津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门，祸恐难测，此战之不可者一也。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必将内变，附近天、河两府土匪以及各属盐枭，久欲观衅而动，一闻有警，盗贼四起，官军应接不暇，此战之不可者二也。直隶府款支绌，运道各库，帑项皆空，兵勇见贼，多易奔溃，火药有限，炮械无存，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此战之不可者三也。国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此战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抚，迅议通商，则关税日充，兵饷有出；不抚而战，虽未闭关，而税课有限，南军待哺嗷嗷，无从筹画，此战之不可者五也。奴才等非不知后患可虞，必应求万全无弊之策，然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于两弊相形之中，聊为避重就轻之法”。（注九）当时清政府正在集中力量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内镇压，对外投降，正是清王朝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一八五八年六月间清政府先后与俄、美、英、法订立了屈辱的《天津条约》。中国方面的代表是桂良、花沙

纳，英、法、美、俄的代表是额尔金、葛罗、列威廉、普提雅廷。其中俄、美两国以“调解人”名义，用伪善面目和狡诈手段，在中英、中法条约签字以前（六月十三日和十八日）即已诱骗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两国不费一兵一卒，就从清政府取得许多权利。俄约中还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以前未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后在“勘界”名义下割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

（2）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第二次进攻大沽口

《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在北京互换正式条约。帝国主义者野心勃勃，贪婪无厌，早就预谋趁换约机会对清政府再施加压力，攫取更多权利。而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却担心“外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条款，将会成为颠覆自己统治地位的隐患，感到惶惶不安。一八五八年十月清政府又在上海和英、法、美三国举行改订税则及通商章程会议，竟妄想通过这个会议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中的某些条款，这当然是徒劳的梦想。帝国主义对于既得权利无疑不肯轻易放手，而清政府负责谈判的何桂清、桂良、花沙纳等都是被帝国主义吓破胆的彻底投降派，所以在会议桌上全凭侵略者摆弄，清政府的幻想意图丝毫也未实现。

清政府在天津战败后，深怕人民轻视自己的统治力

量，为了挽回面子，不得不虚张声势，在大沽口整顿防务，修建炮台，增添守兵，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大学士瑞麟负责主持。面对清政府这种似乎不肯服输的架子，侵略者决定乘翌年换约的时机，再给清政府来个下马威。

一八五九年，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乘船北上换约。英国政府早就指令卜鲁斯“必须有一支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因此由英国侵略军头目海军上将贺布率领一支强大舰队（包括一艘大战舰，两艘巡洋主力舰，十三艘炮艇），分载二千名士兵（包括陆战队近千人，工兵若干人）随同北上。另有美国兵船三艘随行。六月中旬，侵略舰队驶抵大沽口外。

清政府在大沽口设防，只是摆摆样子，一听侵略者兴师动众地前来换约，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命令僧格林沁：“倘该夷虚放空炮，入口试探，……勿令官兵轻举妄动”，一面又向侵略军解释，因大沽口已设障碍，请三国公使改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侵略者正要借此挑衅，拒绝改途，并照会天津道，限三天撤除海口所设木筏、铁钎等障碍物。六月廿三日，清政府再次请换约公使由北塘去京，英、法公使不予理睬。二十四日夜，侵略军用舢板潜入河道，炸断拦河铁链二根。二十五日早，开始大规模进犯。先以三艘兵舰曳倒铁钎二十余架，然后大队兵舰驶向炮台，悬旗挑战。炮台守军因奉命不得先行开炮，只好隐忍以待。接着各舰蜂拥直上，冲向第二座炮台，但两次都被铁链拦

截，于是开炮向炮台轰击。守军忍无可忍，立刻一齐还击，由于炮手技术纯熟，射程计算准确，炮战始终处于优势。侵略军兵舰四艘被击沉，六艘受重伤。其余挂起白旗投降，但随即又无耻地躲向破船背后，向炮台轰击，炮战至晚不停。同时侵略军的陆战队八、九百人分乘舢板二十余只，企图在南炮台河岸登陆，遭到守军密集炮火射击，被迫退藏附近芦苇地内，夜间又“伏地抢进，不辨远近，守军以火弹喷筒御之，每光火一亮，瞥见该夷，即排施枪炮，对准开放，该夷术穷力尽，不敢恋战，向船逃窜，守军至天明始行收队”。战斗延续一昼夜，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除毁伤敌舰十艘外，还毙伤英军四百六十四人，法军十四人；英军官死五人，伤二十三人，侵略军头子、舰队司令贺布也被打伤，他的副手被击毙。战后“沿河夷尸堆积，除该夷拉运上船外，尚余一百数十具”，伤亡惨重。此外还俘获“舢板三只，洋枪四十杆及什物多件”，生擒英、美兵各一名。侵略军被打得狼狈逃窜，英、法公使逃往上海，败残舰队则逃往宁波口外镇海海面集结。

清军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六名官员及守兵三十二名英勇战死。大沽炮台安然无恙。当海口防军向侵略军反击时，大沽一带居民同仇敌忾，振奋踊跃，争先馈送饼面食物，大大鼓舞了坚守国防前线的抗敌将士，这说明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屈服于侵略者的暴力压迫，也证明只要敢于拿起武器，敢于斗争，弱国可以打败强国。

尽管天津大沽口打了胜仗，北京也得以保全，可是腐朽反动的清政府为了勾结帝国主义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竟不惜出卖祖国利益，仍旧向侵略者低声下气，妥协乞降。在敌军败退后，清政府赶忙命令直隶总督恒福通知英、法公使仍来北塘准备换约，命令说：“冀其悔悟转圜，以全抚局”，“此事如有可乘之机，恒福等切不可失，是为至要！”可见其要求投降如何迫切！同时这些昏聩庸懦的封建统治者，唯恐侵略者再来报复，竟妄想拉拢与英国一鼻孔出气的美、法来劝阻英国不要再以武力进犯，这不仅是与虎谋皮，请贼喻盗，而且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心虚胆怯，软弱无能。英使卜鲁斯对于清政府的乞降活动，根本不予理睬，专待伦敦的指示。

当战败消息传到伦敦时，触怒了英国资产阶级，它们大肆咆哮，叫嚣要实行恐怖报复。伦敦的《每日电讯》写道：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

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应该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够象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们为俄国在帝国满州边境所取得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注十）

这种凶恶狂妄的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英帝国主义贪婪的侵略野心及其同沙俄争夺中国的残暴狰狞面目。

（3）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第三次入侵天津

一八六〇年夏，英、法两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葛罗终于再率军北犯。侵略联军这次大规模地出动，计有战舰和运输船二百余艘，英军一万零五百名，法军六千三百名，于一八六〇年七月底开到大沽口。清政府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但求苟安妥协，因此屡次命令僧格林沁等“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功挑衅”。（注十一）清政府还幻想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与侵略者握手言和，所以撤去北塘防御设备，以便让外国使节登陆换约。但事与愿违，北塘撤防不仅丝毫没有动摇英、法侵略的决心，反而在大沽防御线上造成极大缺口。八月一日，英、法侵略军就在北塘拔去木桩登陆，清军仍不采取措施，使侵略军有充分时间从事进

攻准备。十二日，英、法联军万余人由北塘分头进攻新河及军粮城。僧格林沁以骑兵迎战，这个大刽子手镇压太平军时十分卖力，对付洋人却是个十足的脓包，他愚蠢地将三千名骑兵排成密集队形冲锋，侵略军却将七百人散开，每人相隔数十步，阵长数里，将清军包围，越围越紧，清军突围欲出，但因骑兵密集，目标显著，遂为众枪之的，纷纷被击落马，最后全军覆没，三千马队只逃出七人。虽有都统西凌阿由营城率马队二千五百人来援，杀死侵略军数十名，生擒十九名，但亦未能挽回败局。新河失守，驻扎军粮城一带的副都统德兴阿军营同时被攻陷，僧军退守唐儿沽(塘沽)。十四日侵略军大举进攻唐儿沽，炮火猛烈，相持二小时，侵略军复自苇塘潜抄清军后路，清军溃败，伤亡甚重，遂撤去浮桥，退入北岸炮台。侵略军占领新河、塘沽后，又包抄大沽口后路，大沽炮台遂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

清廷闻报，十分恐慌，一面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往北塘口，劝说英、法代表去京换约，一面指示僧格林沁不要“拚命”抵抗，“上谕”说：“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注十二）僧格林沁接到谕旨，有了逃跑借口；而英、法却拒绝换约请求。八月二十一日，侵略军一万人进攻大沽北炮台，守将提督乐善奋勇迎击，激战三小时，火药库中弹爆炸，乐

善阵亡，北炮台遂失陷。南炮台原比北炮台坚固，但主持南炮台的僧格林沁一心逃跑，见北炮台失守，就“传飭各营，竖立免战白旗”，（注十三）当夜就逃出大沽，马不停蹄，一口气跑了几百里，二十三日已经跑到通州以南的张家湾。

僧格林沁逃跑后，直隶总督恒福就把大沽口南炮台奉送给侵略军，连同守军二千人全部投降。侵略者在各炮台掠夺五百门炮。（注十四）英法联军随向天津进发，恒福抢先抵津，办理投降事宜，并为联军张罗粮宿供应。侵略军未动刀枪即于二十四日占领天津，宣布天津交军事管理，由英人巴夏礼统治一切。从此天津沦陷，北京门户洞开。

天津失陷后，谈判重新开始。投降老手桂良和恒福奉命谈判，投降条件除全盘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加赔偿军费、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项。咸丰对这些新增条款犹豫不决。侵略军不愿在谈判桌上拖延时间，宣布谈判中止。由于大沽口、天津的屏障已失，侵略军遂于九月上旬向北京长驱直进，十三日先头部队抵达河西务。清军虽在张家湾、八里桥进行抵抗，均告失败。二十二日，咸丰率领后、妃及一些大官僚仓皇逃奔热河，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接洽投降事宜。

九月底，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因粮弹告罄，暂停攻势。十月五日，侵略军从天津得到兵员和粮弹的补充，又发动攻势。负责保卫京城的僧格林沁、胜保、瑞麟等望风